

从睁眼看世界到雄心勃勃,中国种业对外开放的4个十年

刘法钊

(南方农村报 农财宝典,广州 510601)

1982年,中国种子公司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下属的园环种子公司签下一份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合同。在签定合同仪式上,中方代表马克让向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先生提供杂交水稻亲本种子。我国首次转让农业技术,就定格在这一画面。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跨过4个十年。尽管中国种业市场化起步较晚,但对外开放的历程与改革开放却是同步的。杂交水稻的这次技术转让,是种业改革开放后,中外双方打破壁垒,合作交流,共同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4个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种子产业乘改革开放之春风,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引入种业发达国家的资源、技术与经验,最终从基础薄弱成长为千亿级别的产业。40年来,对外开放的中国种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发展。

1 第1个十年(1978-1988年):睁眼看世界

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给种子的国际交流、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1979年起,中国种子公司与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等农业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开展种子的交流合作和种子贸易活动。1979年,以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种子公司总经理刘锡庚为团长的种子代表团率先考察了美国、奥地利两国的种子培育、管理等方面工作。1982年又恢复与苏联种质资源的交换和种子贸易活动。

为了迅速学习种业发达国家的种业模式,中国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洽谈贸易。仅中国种子公司1979-2005年就组织有种子系统、科研单位、农业院校等方面人员参加的技术培训小组25个、87人,分别到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典、英国等国家的种子机构接受技术培训;种子考察团65个,280多人次,分别到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考察种子技术、种子生产、种子市场和种子科研等;种子贸易代表团、贸易小组120多个,380余人次,到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洽谈贸易。

除直接派员到国外参观学习,中国更是大力鼓励外商来华考察投资,如中国种子公司在1981-1982年,每年接待洽谈贸易的团组有200多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种子公司与中国种子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中国种子公司自加入国际种子贸易协会和亚太地区种子贸易协会后,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会议和贸易活动,与世界各国同行广泛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开始熟悉国际种子贸易规则,探讨合作,洽谈贸易。

1978-1988年,是中国种业积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的十年。在这段时期,中外种业开始互相接触、了解并建立互信,为下一阶段的高速发展积蓄能量。

2 第2个十年(1989-1998年):高速发展

在上一个十年的积累之下,第2个十年是中外种业合作的高速发展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孟山都成为首个吃螃蟹的种企,率先在上海设立销售业务代表处,随后美国先锋良种、圣尼斯,瑞士先正达,法国利马格兰,纷纷来华设立办事处。有了孟山都、先锋良种等国际巨头在前面引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种业迎来一股外企的入驻潮。

玉米是我国最大的粮食作物之一,出现了大量中外合作成果。1998年,当时全球第一大玉米种子公司美国先锋种业(1999年被杜邦收购)成立了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先锋),进入中国的玉米主产区东北。先锋中国公司的科研人员结合中国玉米种质、土壤与气候条件,先后培育出20余个“先玉”品牌杂交玉米品种,在我国春玉米和夏玉米种植区广受欢迎。

除了外国种企积极来到中国开拓市场,国内种业人也在这一阶段的中外种业交流中受益匪浅。1988年,现任上海市惠和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惠彪仍在上海市种子公司工作,在这一年被外派至日本知名种企八江农艺株式会社交流学习,成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种业人。在这段时间,郑惠彪感受到了落后与先进的距离。“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东

西。”郑惠彪回忆道,无论是在育种理念、栽培技术、品种资源等各种指标上,中国都要远远落后于日本。回到上海的郑惠彪,当即确定了要将国外品种引入到国内销售的想法。1990年,郑惠彪从日本引进了我国第一个小型西瓜品种早春红玉,在国内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下,小型高品质西瓜开始在经济发达地区风靡并向周边辐射。发展至今,高产个大的西瓜品种已经慢慢失去踪迹,小型好吃的品种渐成市场主流。这是国外资源改变国内品种面貌的典型个案。

1989-1998年,是中外种业合作交流高速发展的十年。在这一阶段,大量外资种企进入中国,带来品种、技术与经验,中国种业的整体水平也因此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3 第3个十年(1999-2008年):合资时代

经过长达十余年的高速发展,2001年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数量达到63家。与此同时,中国种子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2000年,首部《种子法》正式出台,允许民企进入行业。随后几年,大量种企成立,数量上一度超过2万家。但欣欣向荣的表面,实际暗藏着危机。这些企业,受制于起步晚、底子薄的原因,基本为贸易型企业,极少有企业具备育种研发能力。

对弱勢的产业加以保护,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准则。相对于已经发展超过一个世纪的种业外企,中国本土的种业显然是弱勢的一方。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开始收紧有关政策,提高外资进入种业的门槛。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是一个国家战略性的、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重于泰山。将种业这条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无可争议的选择。

但面对落后的现实,一味地保护并不可取。在权衡利弊之下,中国种业走出了一条“合资”道路。2002年,在新版本的《负面清单》中,粮食(包括马铃薯)、棉花和油料三大农作物种子的开发生产被列入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1%,珍贵优良品种的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种子被列入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07年,政策限制加码,要求所有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开发生产必须由中方控股,珍贵优良品种的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种子依旧禁止外商进入。在《负面清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的要求之下,中国种业的国际合作开始进入合资时代。

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本土种业开始积累起大

量的资源、技术、经验以及人才。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马淑萍认为:“跨国企业理念先进,拥有优良品种和技术,有样板在身边可以学习。”合资模式,让中国种业整体水平获得加速提升。

在这一时期,随着本土种业的成长,以及中国限制政策的加码,外商对中国种业的投资开始降温。最直观的变化是外资种企数量的变化,2001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年减少,直到2015年外资种企仅剩25家。

4 第4个十年(2009-2018年):雄心勃勃的种业新时代

中国种业从开放到保护,又将迎来她的开放周期。在2018年6月份公布的《负面清单》中,“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一项变更成为“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意味着除了小麦和玉米两大作物,其他农作物的种子市场再次向外资抛去了橄榄枝。现有的4300多家中国种企,如同被保护了十几年的鹿群一般,将再面临种业外企狼群的竞争。

对于此轮种业开放,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认为:“种业扩大对外开放,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对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本轮开放,与1978年的局面早已大不相同。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农业种子用种量已位居全球第一,随着种子商品化率的提高,种子市场价值逐年上升,居世界第2位。2017年6月,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完成对全球第一大农药、第三大种子农化高科技公司瑞士先正达的收购。随着拜耳对孟山都收购的完成,全球种业大国由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变为德国、美国、中国、法国,德国成为世界种业绝对强国,中国站上了世界种业舞台。

除了直接收购世界农化巨头,本土种企实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在2017年,隆平高科排名世界种业第9位,荃银高科排名第20位,还有大量的企业在不断崛起之中。40年改革开放的成效,让中国种业再次走向世界舞台,呈现的是一种雄心勃勃的大国心态。

改革开放的到来开启了中国种业发展的新时代。在不同的时期,中国种业经历了睁眼看世界、高速发展、合资时代,如今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4个十年。如今开放再次到来,相信我们早已厉兵秣马,蓄势待发。

(收稿日期:2018-11-27)